

中美关系

美国应采取行动化解中美竞争的风险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近日载文称，特朗普和拜登正在争论谁是更大的对华鹰派，但下届美国政府应该从冷战中吸取教训，化解中美竞争的风险。文章摘要如下：

在本次大选期间，特朗普和拜登在中国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如果说有什么进展，那就是拜登已经叫停了特朗普无效的对华政策，并承诺会对北京更加强硬。

美国迫切需要重启对华辩论。美中之间目前的紧张局势不可能持续下去而不造成破坏。下届政府必须迅速地直面美中竞争。美国必须为正在进行的竞争制定规则，以防止意外爆发的军事敌对或网络冲突威胁全球和平与稳定。

下届政府必须与中国领导人坐下来，安排定期峰会会晤，这将迫使双方相关机构在一系列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必须设法就网络冲突的上限进行谈判，并加强海军在争议海域接触的规则。双方还需共同做出承诺，在没有事先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会努力克制自己，避免做出鲁莽的举动。

美专家和民众对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看法存在差异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近日载文称，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与普通民众对于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看法具有很大差异。

文章称，美国民众尤其关注新冠肺炎的传播，且更倾向于将当前的疫情归咎于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则对中国应对疫情的看法更积极，对美国的反应则持严厉批评态度。

民调数据显示，在衡量各国和多边机构如何应对新冠疫情暴发的问题上，61%的专家认为中国处理得当，而持该观点的美国民众只有31%。对于美国的应对措施，只有3%的专家认为美国在控制疫情方面做得很好，而4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做得很好。

虽然专家和美国民众对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但二者对中美关系优先发展方向的看法相似。两个群体中都有约四分之三的人认为，美国应促进中国的人权，即使这可能损害两国的经济关系。相比之下，约四分之一的专家和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优先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而非关注人权问题。

美学者葛来仪鼓吹加强美台关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S. Glaser）等执笔的报告，为如何加强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主要建议如下：

第一，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相结合，包括确保美国对盟友和伙伴承诺的可信度，对自由开放地区秩序面临的胁迫性和修正主义威胁予以打击，制定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中美关系。《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对台六项保证”应继续成为美国对台政策框架的核心。

第二，加强美台经济和技术关系。正式就“美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展开探索性对话，利用最近宣布的“美台经济与商业对话”平台，扩大和提升美台在贸易谈判以外的议题上的双边合作，如技术安全、全球供应链、劳动力市场和能源供应等。支持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第三，加强美台防务和安全合作。美方应在公开声明中重申，

台海和平与稳定关系到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对台湾安全展开高级别、跨部门和综合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一套新的工具来加强威慑并更好地塑造中国领导人的意图。

第四，为美台内阁和次内阁级官员提供更多交流机会，就对双方都很重要的问题进行沟通。鼓励和支持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日本）与台湾进行 1.5 轨三边战略讨论，并协助台湾扩大与多边组织的接触。

第五，加强国会和地方政府与台湾的接触。鼓励国会、州和地方代表团将台湾作为亚洲行的常规目的地，并鼓励国会两院的一些重要委员会每年就台湾议题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增加对富布赖特台湾和其他项目的资金支持，以促进美台学术交流。

美学者谈如何理解中美战略竞争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研究员保罗·希尔（Paul Heer）近日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撰文称，美国当前盛行的有关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分析 and 评论误解或歪曲了中国挑战的性质，不利于美国正确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文章称，当今中美竞争是一场在东亚和全球范围内争夺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全方位大国竞争。这主要是有关政治治理、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国际秩序结构和规则的观点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未必是一种敌对或零和博弈、赢家通吃的竞争，双边合作对两国和世界来说都至关重要。

与美苏之间的竞争不同，中美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存在性的意识形态之争，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并不相互排斥。中国并不寻求破坏美国的制度或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而试图在推动多极化的框架下，寻求将自身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合法化，使国际

体系更能反映和代表世界在 21 世纪的力量平衡。

因此，美国需认识到并承认，当前中美间的相对影响力和能力已经发生改变，华盛顿需要重新评估其对华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并在与北京的交往中进一步权衡和实现对等。美国也应认识到其在东亚或全球的“主导地位”几乎肯定不再可行或可持续。

基于上述战略现实，美国应该：首先，集中精力恢复和调动其经济和技术竞争力；第二，重振和动员自身外交能力，与中国进行广泛接触；第三，重视传统安全领域，在军事、太空、情报、网络等行动领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能力和威慑力，同时避免在台湾、南海、朝鲜等问题上过度军事化；第四，重振盟友和伙伴网络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第五，解决当前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从而提升美国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

美智库煽动制定跨大西洋方案应对中国挑战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近期发布报告称，中国崛起已成为美欧关系的焦点之一，如今跨大西洋两岸合作条件已经成熟，双方应从技术、投资、贸易、治理等方面合作应对中国。报告摘要如下：

中国崛起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渗透到跨大西洋的政策议程之中，并成为美欧关系的一大焦点。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大西洋伙伴之间产生分歧甚至是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但在过去两年中，美欧双方对中国的看法趋于一致。

中国共产党日益强硬的行动，已经导致美国和欧洲的担忧上升。现在，大西洋两岸开展广泛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合作的范围从减少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依赖，到制定未来全球的规范和标准。在这些领域，尽管目前美欧双方观点和利益趋于一致，但关于如何推进合作，仍没有具体的路线图。

为此，本报告制定了应对方案，其前提是大西洋两岸在应对中国挑战问题上合作时机业已成熟，并且双方认识到当前任务具有广泛性的特征。今天美欧与中国在贸易、投资、技术和全球治理方面的争论，都是双方政治制度和世界观之争的一部分，意味着美欧必须在多个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

在制定跨大西洋对华政策时，决策者应考虑以下六项原则：第一，带着紧迫感行动；第二，制定一致（至少协调）的外交政策；第三，提升美国和欧洲自身的竞争力；第四，在各层面与欧洲展开接触；第五，扩大与跨大西洋之外国家的合作；第六，保持开放的态度与中国接触。

本报告从技术、投资、贸易、治理四个方面，提出了美欧应对中国崛起的“跨大西洋路线图”：技术方面，保护美国和欧洲的技术优势，与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展开竞争，制定规范和标准，对抗中国的“数字威权主义”；投资方面，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投资审查机制，拓宽投资审查对话和跨大西洋协调范围，着眼中国投资之外的事项；贸易方面，修复美欧经济关系并且重建互信，促进贸易公平体系，确保美国和欧盟享有技术优势；治理方面，重新提出国际机制，提高联合国体系的能见度，深化知识共享，重新定义竞争。

通过美欧共同努力，双方可以在上述领域集中必要的资源和影响力来反击中国，并发展自己的替代方案，最终推进美欧双方的战略重点。

美国外交

下届美国政府应修复美失败的外交政策

美国前陆军中校丹尼尔·戴维斯 (Daniel L. Davis) 近日撰文称, 如果下届政府不改变美国与世界接触的方式, 那么美国就有遭受灾难性损失的风险。他建议美国采取“建设性现实主义”的方式, 将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文章称, 自“9·11”事件以来, 美国就开始采取“军事优先”的方式处理全球事务, 这一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还恶化了美国的安全形势。无论哪位候选人在今年的大选中获胜, 美国政府都应该改变过去失败的外交政策。如果特朗普获胜, 他不能再继续过去四年的现状; 如果拜登获胜, 他也不能仅重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

美国应采取更优越、更低廉的方法保证自身安全和繁荣, 即“建设性现实主义”的新方法。制定政策最大限度发挥政府保护美国公民安全的能力, 同时与世界所有国家和团体尽可能建立最好的关系。政策应建立在对美国如何最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客观评估之上, 并通过提高外交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作用, 来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同时, 美国也应保持威慑, 建设一支具有不可战胜的防务能力的武装力量, 击败任何攻击并让试图发起攻击的敌人付出惨重代价。

推进前沿防御: 美国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的角色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 10 月 15 日载文称, 美国在亚洲构建的安全架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美国需要以新的方式领导和组织

盟友和伙伴。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在亚洲构建的安全架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挑战来自三个因素：盟友对美国可靠性和能力的质疑；中国在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等地的活动；盟国和合作伙伴寻求更独立的防御能力。

中国数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为军队现代化提供了资源。美国仍保持着对中国的总体军事优势，但在亚洲这一差距正在缩小，美国在某些领域的领先地位可能已经消失。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地区力量平衡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向中国倾斜。

近年来，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的离心力明显增强。盟国在防御能力上的努力有助于解决美国长期以来对其能力和责任分摊的忧虑，但也可能带来新的战略和协调挑战。因为盟国会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后院，而不考虑整个战区的安全问题，甚至可能采取与美国安全利益背道而驰的行为。这些国家都已经开始仔细地、悄无声息地讨论如何规划更加依赖自身防御能力的未来。

美国下任国防部长应优先考虑以下措施：增强盟友的威慑和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重新考量盟友和伙伴间角色、责任和首要努力的方向，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在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之间整合建立一个更大的网络；扩大与其他盟国和伙伴，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在澳洲北部的海军联合演习、海上安全和岛屿防御训练。

美专家：美国在中东的存在有利于维护其在亚洲的利益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10月19日登载该智库高级副总裁、中东项目主任乔恩·奥特曼（Jon Alterma）的文章称，美国维持中东地区的存在有助于维护其在亚洲的利益。摘要如下：

特朗普所有的外交政策想法中，最能得到公众支持的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投入过度。与美国的亚洲伙伴谈论这一想法时情况

则不同，因为它们几乎完全依赖中东地区的能源，担心若美国从该地区转向，本国更容易受到地区动荡和中国压力的影响。简言之，它们担心美国以牺牲中东为代价加大对中国的关注会弄巧成拙，因为美国放弃中东实际上会让中国在亚洲更具主导地位。

能源是核心问题。美中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但随着页岩气的开发，美国 2019 年成为能源净出口国。而亚洲情况截然不同，从中东大量进口天然气加深了亚洲与该地区的联系。

中国密切关注着中东，同时中东也更加依赖中国。美国的亚洲盟友看到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日益上升，而美国似乎正在后退，它们担心自己会受到挤压，以及中国会寻求在中东占据主导地位，然后利用其在中东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

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是，美国与亚洲盟国加强合作，以推进在中东的共同安全利益；另一个选择是，在确定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先事项时要更有选择性，承认中国在中东地区某些方面的崛起可能是不可阻挡的。

美国可能想从中东撤军，但只要亚洲盟友看到自身在中东有关键利害关系，美国在亚洲的未来就需要在中东的未来。美国应该与中东和亚洲盟国政府一道，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塑造它。

美学者：美日责任分担不应局限于费用问题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近日载文称，是时候改变美日同盟关系，美日责任分担不应局限于费用的分摊。文章摘要如下：

在特朗普任内，美日关系围绕悬而未决的分摊费用谈判而乌云密布。责任分担问题的核心涉及一个现实：随着地缘政治环境更具威胁性，以及来自中国的挑战日益严峻，美国需要日本在双

边联盟和其他方面付出更多。然而，特朗普政府对费用分担的狭隘关注忽视了日本在各方面已开展的大量工作。

美日都对中国崛起愈加担忧，并意识到其带来的挑战是多层面的。除美国外，没有其他国家（像日本）在这四个领域如此关键：首先，地理位置和强大军事实力使日本对保持地区力量平衡举足轻重；第二，日本作为第三大经济体，对于在共同公平标准的基础上开展更深入的经济合作至关重要；第三，日本技术先进，这使它将是任何旨在替代依赖中国技术的联盟的关键成员；第四，日本作为成熟的民主国家致力于塑造自由规范的环境。

简言之，日本是美国应对中国所需的一切战略和联盟的基石。为使全球最重要的双边联盟的价值最大化，美国需要接受更广义的分担责任概念，并将日本视为已有的平等盟友，而非曾经的初级伙伴。

美前高官建言新政府如何应对外交政策考验

外交政策需要平衡目的、方式、财富、安全形势这四个经典变量。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衡是由四个变量中的两个造成的。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詹姆斯·温尼菲尔德 (James A. Winnefeld Jr.)、美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迈克尔·莫瑞尔 (Michael J. Morell) 以及美国防部前助理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日前在《外交事务》期刊网站联合撰文称，明年无论谁入主白宫，美国都将面临自冷战初期以来最艰难的外交政策考验。文章摘要如下：

外交政策需要目的 (ends)、方式 (ways)、财富 (means)、安全形势 (security landscape) 这四个经典变量之间保持平衡。

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衡是由四个变量中的两个造成的。

首先，过去二十年来全球形势发生变化，包括美国与其主要竞争对手的相对实力对比发生重大转变，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其次，美国选民正在发出信号，希望国内问题获得更多关注和资源，且美国政府债务已扩大到此前认为不可持续的水平，因此，用于外交政策的总资源几乎肯定会减少。

下届政府将不得不努力应对这两个战略变量带来的负面趋势。与此同时，政府还需关注其他两个变量，因为这两个变量是它最能控制的：目的和方式。它需要更有原则地调整目的，更有想象力地使用各种方式，包括国家实力的所有工具。

调整目的要求政府采用一种严格的框架，对不同利益进行分级，从而为外交政策决策提供指导。一个关于威胁和选择的框架应包括五个等级的利益：首先是美国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生存；二是防止美国及其公民受到灾难性袭击；三是保护全球运作体系和美国在其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四是支持盟友和伙伴，保障其安全；最后是保护普世价值，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推广普世价值。

面对日益恶化的安全形势和有限的财富，要维持平衡、实现最重要的目的，只能依赖于最后一个变量：方式。但改变方式可能比调整目的更难。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新方式都要求改变国家实力要素之间和实际使用这些要素的机构内部的资金分配方式。尽管如此，下届政府仍有机会重新调整其使用美国国力各要素的方式，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目标。

美国政治/其他

美媒分析美大选中的“隐藏变数”

《政客》杂志网站近日载文称，尽管按照专家和学者对本次美国大选的预测，拜登胜算更大，但民主党人正在努力解释那些可能重现 2016 年大选情形的隐藏变数。文章摘要如下：

共和党在关键州的登记率有所上升，而民主党的现场活动却处于休眠状态。民主党的投票率在早期投票中激增，但目前尚不清楚民主党在早期投票中会建立多大的优势，是否足以战胜预期将在 11 月 3 日出现的共和党人亲自投票的热潮。

对民主党来说，不确定哪些人正在投票只是一部分变数，目前也不清楚在哪些州会有多少邮寄选票最终会成为废票。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宾夕法尼亚州法院上个月裁定所谓裸选票（没有信封包裹的选票）不能被计算在内。选举官员称，超过 10 万张选票可能会被宣布无效。共和党在其他一些州也成功推动法庭裁决禁止选举日之后到达的邮寄选票被计算在内。年轻选民也存在不确定性，因为他们退回选票的速度比老年选民慢。某些摇摆州民调的准确性和共和党选民的压制措施同样存在不确定性。

许多民主党人仍然怀疑所谓“安静”或“害羞”的特朗普选民仍然存在，这些人拒绝在民调中透露自己支持一位极端的总统。许多共和党领导人，特别是地方的共和党领导人，对此深信不疑。

三个州仍是 2020 年大选的关键所在

美媒 Msn 网站近日载文称，和 2016 年的大选一样，2020 年大选仍可能由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这三个北方

工业州决定。文章摘要如下：

虽然拜登及其顾问有数种选择来获得必要的 270 张选举人票，但拜登团队认为，确保胜利最合理的策略仍然是通过赢得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特朗普通往胜利的道路更少，这三个关键州成为他赢得 270 张选举人票的唯一可行路线。

在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表现出明显的投票热情。在密歇根州，民主党人认为情况比四年前好，但仍有顾虑：一个是底特律的投票率，希拉里 2016 年没有达到对付特朗普所需要的投票率；另一个是尽管郊区女性选民预计会更支持拜登，但其投票率是否会达到所需的水平仍存在不确定性；第三个不确定因素是，共和党人的投票率是否会在选举日大幅增加。

对于民主党人来说，宾夕法尼亚州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临界点”州，这意味着该州最有可能使拜登获得 270 张选举人票。对特朗普来说，假设他守住 2016 年获胜的其他州，赢得宾夕法尼亚州及其 20 张选举人票将确保他成功连任，即使他输掉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

这三个州还有一个共同点：将在大选结束后才开始统计邮寄选票。因此，如果大选结果在选举日仍不确定，而且两党差距非常接近，那么大选结果在几天后才能见分晓。

CSIS 报告建言美国扩大创新优势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发布报告称，美国几十年来一直走在创新前沿，如今其领头羊的地位面临威胁，对此，美决策者需采取措施，扩大创新优势。报告摘要如下：

自二战以来，美国是全球前沿知识与技术发展的领头羊。数十年间，美国之所以能一直走在创新前沿，主要依赖充满活力的

私营部门、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大军、一流的大学、联邦政府对研发的支持以及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技术优势不仅带来了更高的收入、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而且支撑了国家安全，巩固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展望未来，美国科技的非凡实力对于美国的发展、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美国的决策者变得自满，沉迷于冷战模式的成功，未对创新体系进行维护或是现代化。过去几十年，尽管私营部门的支出增加，但政府投入的资金削减，国家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几乎没有增长。中小学的教育成果停滞不前，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发展迅速。因此，目前美国的领导地位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当美国从新冠疫情中复苏时，决策者必须抓住机会重新确保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再次发展创新基础；支持关键技术；设立全球化的目标推动全政府的技术管制政策；在多边技术控制方面与盟国合作；采用国家数据隐私法规；在数据治理原则上与盟友保持一致。

皮尤中心分析美 2020 大选的选民结构

在美国大选中，不仅候选人和议题在两个竞选周期之间会发生变化，选民本身也处于缓慢而持续的变化中。

皮尤研究中心近日载文，分析了 2020 年大选中选民在政党、民族和种族、年龄与教育等方面的变化。摘要如下：

在政党认同方面，皮尤研究中心 2018 年和 2019 年对 12000

多名登记选民的调查显示，约 34% 的登记选民认为自己是独立人士，33% 的选民认为自己是民主党人，29% 的选民人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在独立人士中，49% 的登记选民认同或倾向于民主党，44% 的登记选民认同或倾向于共和党。过去 25 年来，登记选民的政党认同虽未发生显著改变，但自 2017 年以来，民主党相对于共和党在政党认同方面的优势有所减弱。

在民族和种族方面，非西班牙语裔白人美国人在登记选民中的份额最大，达到 69%。西班牙语裔和黑人登记选民分别占 11%，其他族裔背景的选民占 8%。与过去相比，白人选民在登记选民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从 1996 年的 85% 降到了今年的 69%。这一变化在两党都有体现，但白人选民在共和党和倾向共和党的登记选民中所占的比例始终比在民主党和倾向民主党的选民中的比例大得多。2018 年，美国白人占全国合格选民的 67%，但在中西部和中大西洋地区的几个关键战场州，他们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在西部和南部一些摇摆州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在年龄方面，美国选民正趋于老龄化：52% 的登记选民年龄在 50 岁以上，高于 1996 年的 41%。所有登记选民的平均年龄也从 1996 年的 44 岁增加到 2019 年的 50 岁。尽管登记选民长期老龄化，到 2020 年许多“Z 世代”（1996 年后出生的美国人）将首次能够参加总统选举。今年有 10% 的合格选民是“Z 世代”，而 2016 年这一比例仅为 4%。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约 65% 的登记选民没有大学学位，36% 的登记选民拥有大学学位。与共和党（30%）相比，认同或倾向于民主党（41%）的选民更有可能拥有大学学位。

在宗教信仰方面，基督教徒占美国注册选民的大多数（64%），但较 2008 年的 79% 有所下降。在此期间，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的选民比例从 15% 增加到 28%，几乎翻了一番。大约 80% 的共

和党登记选民是基督教徒，而民主党选民中只有大约一半(52%)是基督教徒。反过来，民主党选民比共和党选民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

选民的投票率是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登记选民都会投票，每次选举的投票率也会发生变化。投票率还因种族、年龄和性别等人口因素而异。一些早期迹象显示，今年大选的整体投票率可能会达到历史新高。在今年的大选中，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和公众对选举公正性的担忧共同造成了广泛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评估哪些人将投票、哪些人将不投票比以往更加困难。